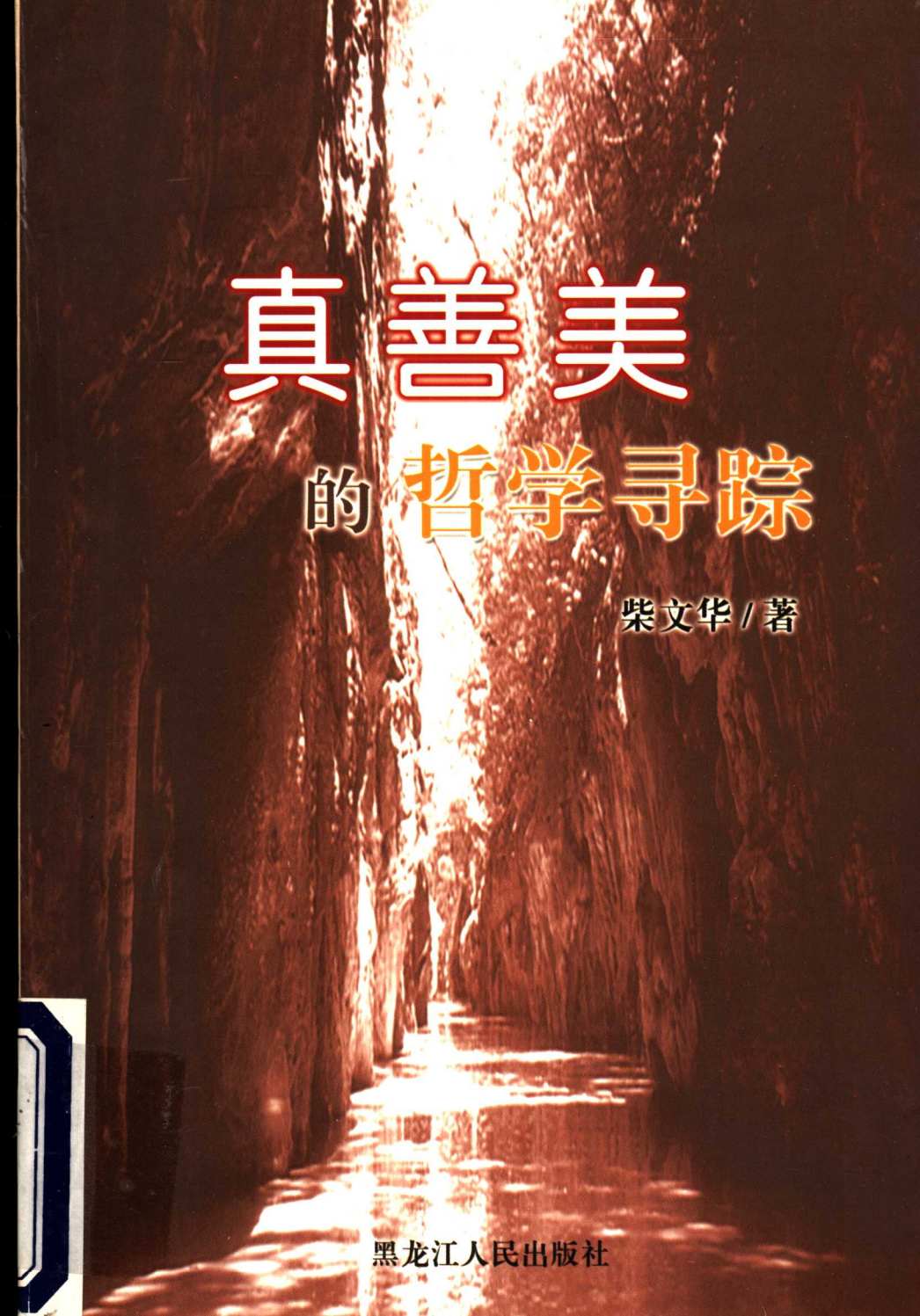




真善美 的哲学寻踪

柴文华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B92-0549/
1

真善美 的哲学寻踪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柴文林 / 著

RBC3/1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善美的哲学寻踪/柴文华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0
ISBN 7-207-06122-6

I. 真… II. 柴… III. 美丑—研究—中国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535 号

责任编辑:王裕江
装帧设计:李 梅

书 名 真善美的哲学寻踪
著 作 者 柴文华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编电话 150008·82281489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0.375
字 数 200 000
印 数 1~1 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122-6/B·191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自序

中国古代学术浑然一体，只是由于把西方的学科分类作为参照系统之后，才出现了所谓历史形态的哲学、伦理学、美学、经济学、政治学、文艺学等学术部门。应当说，真善美的相互渗透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特征，值得今人认真解读。“真”的集中表现是哲学或广义认识论，“善”的集中表现是伦理学，“美”的集中表现是美学。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真与善、认识论与伦理学是一致的

仁知统一。仁知统一是儒家学术的原有之意，对它做出较早阐释的是冯契先生。冯契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从理想人格培养的角度探讨了孔子的仁知统一思想，揭示了仁知统一学说的源头。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范畴，“知”是对这种关系的理性自觉，“知”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从正面讲，理性自觉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知者利人”（《论语·里仁》）；从反面讲，没有理性自觉就不会实现仁，“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按照冯契先生的阐释，这种思想有两层含义，一是合情（仁），二是合理（知）。因此，仁知统一就是合情与合理的统一，它意味着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孔子所提出的仁知统一学说得到了后儒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中源远流长的真善一体的鲜明特色。

以理为仁。这里的“理”指理性，“仁”代表道德，以理为仁指理性的道德化和道德的理性化。这里的“理”不仅仅再是它自身，而是外化或符号化或物态化为道德规范，理即是仁，仁即是理，理仁浑然一体。它从更直接的角度展示出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中真善一体的特色。这种思想在先秦和宋明时代表现的较为突出。在先秦时期，孟子、荀子就把理与礼、义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在孟子看来，人心与其它感觉一样，也有共同的嗜好，这就是理、义。孟子把理义并提，实际上是以义解理，把对善性、美德的追求看作人类理性的天赋内容，表达了一种以真为善，以善为真，真善一体的思想。《荀子·乐记》也曾以礼解理，如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到了宋明时代，理被赋予最高本体的地位，它既是指绝对理念，也是指事物的法则，更代表着封建伦理价值体系的总和，即先在和恒在的“应当”，展示出真善一体的思维范式和理论特色。

知的双重含义。应当说，知在西方哲学中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而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知则具有认识论和伦理学双重意义，它所反映的也是真与善的结合、理与德的渗透、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知行学说以及良知学说中。

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由于受实用理性思维框架的限定，始终未能跳出伦理的羁绊而成为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它主要是伦理学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现代知行学说的出现才告结束。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尽管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等不同的学说类型，但其所知所行的对象既是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也是道德律令，因此，知行关系既具有哲学层次上的认识与实践关系的意义，也具有伦理学层次上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关系的意义，这就决定了这种知行学说既不可能是纯粹的认识论学说，也不可能是纯粹的伦理学学说，而只能是认识论和伦理学相互渗透的一种学说。

“良知”一词较早见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里的良知既是指先在的善性，也是指天赋的认识本能，本身就是善与真、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后儒谈良知最多的是明代的王守仁，在他看来，良知是宇宙的本体，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也是先验的

道德原则，是融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于一炉的典型理论。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真、善与美，认识论、伦理学与美学又是统一的

在主体审美领域，具有智慧（真）和道德（善）被看作人格美的重要标志。在文艺美学领域，真与善被规定为最高的审美规范，只有那些具有较高认知价值和道德教化价值的作品才被认为是美的。早在《论语》中，孔子就提出了“诗无邪”说，“无邪”即“正”，“正”就是严格遵守当时的各种规范，包括思想规范。宋代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说，朱熹提出“发文皆道”说，把融天道与人道于一体的“道”作为最高的审美规范。在文论领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提出“述志为本”说，突出强调文学作品内容的重要性。在绘画美学领域，谢赫提出“气韵生动第一”说，所谓“气韵”含形韵、体韵、神韵等，其中的神韵包括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有人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具有抒情的特点，这是事实。但我们要对“情”做深入的分析。中国古典美学领域中的“情”有时指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但更强调一种理性化的情感，它宣扬情感结构的规格化、统一化，把人类本有的诸多情感因素、心理因素裁定在文艺的大门之外，所谓“情理合一”、“以理统情”正是这个意思，它反映出我国古典美学意识中美与真善相互结合的特点。

作为伴随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生长的真善美决不是仅仅属于历史，它们的高度统一依然是人类应当追寻的理想目标，这就决定了理论形态的真善美永远处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之中，它留给我们的创造空间是十分广阔的。

目 录

真的哲学寻踪

“文化中国”与 21 世纪中国文化	(3)
论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状态	(13)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20)
中国古代思辨的动态平衡思维	(33)
从中国哲学角度谈理论创新与传统	(41)
“歪曲”平议——对一种中国文化解释方法的解释	(49)
中国古代异端人论概说	(54)
先秦人格模型论纲	(64)
孔子真善美的渗透意识	(74)
道家自然原则的多维内蕴	(78)
道家思想文化的现代理论价值	(86)
个体自由的实现途径	(92)
三重序曲：现代中国哲学的开端	(101)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	(113)
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125)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研究——兼评《现代新儒学 与中国现代化》	(136)

善的哲学寻踪

当代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分裂与统一	(149)
中国伦理文化重建的必要性	(153)
生态伦理学:文化的审视价值及其审视	(167)
儒道观念与生态伦理思想断想	(173)
反差与契合:生态伦理与儒道伦理	(177)
论中国两性关系意识的演化	(186)
中国伦理文化的“原型”	(195)
中国伦理思想溯源	(206)
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	(213)
孔墨的人才观	(224)
论学术人格	(231)
论儒家的道德人类学思想	(234)

美的哲学寻踪

论审美人生观	(253)
《诗经》审美心理	(258)
先秦儒道人美学思想	(266)
《文心雕龙》双维参照的思维方法	(270)
《文心雕龙》立体网络的思维方法	(300)
《文心雕龙》动态平衡的思维方法	(308)
后记	(323)

真的哲学寻踪

“文化中国”与 21 世纪中国文化

“文化”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本文所谓“文化”特指狭义文化，即思想文化。

“文化中国”是近年来学界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先生曾经介绍说：“80 年代初，马来西亚一群华侨青年创办《青年中国》杂志，曾经出过一期‘文化中国’专号。这是较早地使用这一概念，但不知他们是否还另有所据？1987 年，台湾《文星》杂志也出过‘文化中国’专号，不过此时这个概念已在港台报刊上经常出现了。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对此宣传、鼓吹最力，他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东大图书公司，1988 年），力图用‘文化中国’的理念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①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杜维明先生指出，“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是针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这种情况而提出的。这不是一个政体，不是一个党派，而是各个地方的中华民族，或者说广义的华人的一种自觉。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中国”可以有三个希望能够健康互动（有时当然也有所冲突——原注）的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由中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港澳地区所组成的。第二个意义世界是由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所组成的，它差不多超过了 3600 万人。华人

^① 方克立：《“文化中国”概念小议》，见《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第 506 页。

在马来西亚占人口的 28%；在泰国占人口的 10%；在印度尼西亚虽然低于 2%，但华人的经济力量超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 50%；在菲律宾虽然也低于 3%，但华人的经济力量也超出菲律宾经济的 50%。第三个意义世界包括世界上所有从事研究、报导、传播与中国有关事务的学者、记者、官员和企业家。总之，中华民族所共同组成的文化世界决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它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①“中国文化”是一个共时态和历时态相互统一的概念，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质，又贯通着历史性和层次性等。“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实文化以及中国未来文化。

应当说，“文化中国”概念的提出，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从“文化中国”的角度展望，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一种多元发展的文化。如果说“文化中国”有什么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只能是经过现代诠释和创造性转换的中国传统文化。21 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将在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独立化的自我。

二

从“文化中国”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看，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一种多元发展的文化。

杜维明先生所说的三个意义世界涵盖宽广，展示了“文化中国”的世界性，其中明显地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和多维的价值系统，如新加坡文化、马来西亚文化等，即使抛开“文化中国”中的这些外国文化类型，依然存在着大陆文化、港澳文化、台湾文化。1997 年香港回归，1999 年澳门回归，“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至少要延续到 21 世纪中叶。

^① 杜维明：《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见《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第 17—18 页。

上述情况决定了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必然是两种制度并存、多种文化类型同在、多维价值体系共生的社会，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一种多元发展的文化。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种具体文化类型的并存：

第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大陆正在形成中的一种主流文化，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基础，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同时向资本主义文化开放，力图借鉴、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立足大陆的现实，建构一种崭新的文化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历过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又由科学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包括思想路线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发展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对外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论、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论、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论、“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论、社会主义军队和国防建设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论，等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中僵化成份的清算，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典范。由于大陆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因此，21 世纪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代。

第二，三民主义文化。三民主义文化是台湾的主流文化之一，它最早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后来得到了逐步发展。三民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等都是三民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不同形态，还有一些人对三民主义哲学作过各种解释和发挥，如戴季陶的《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台湾也出版了

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大陆学术界过去除孙中山外，对三民主义哲学的后来发展很少关注和研究，但是不能否认这派哲学也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①事实上，三民主义文化在台湾也得到了—些发展，比如蒋介石 1966 年 11 月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中指出：“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②把三民主义与科学、民主以及中华文化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试图融会中西文化的开放心态。21 世纪，无论祖国统一的目标能否实现，三民主义文化都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从而构成多元发展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6

第三，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是由文化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文化，它在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力图引导中国走上西方现代化所提供的发展道路。西学东渐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从胡适的“全盘西化”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及大陆的《河殇》等，自由主义文化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一代代的青年知识分子。21 世纪，由于自由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港澳文化的存在，由于大陆仍然要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由于台湾文化中胡适所宣传的实验派学术将继续产生作用，也由于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一些世界性因素，自由主义文化仍将在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文化。现代新儒学并不一概反对现代化，而是倡导一种“儒家资本主义”，力图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从儒家传统的内圣之学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以克服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接续

^① 方克立：《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书同上，第 547 页。

^② 转引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二册，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 31 日版，第 615 页。

上中华文化发展的一线血脉。他们的思路是一种“双向格义”，既用现代格义传统，也用传统格义现代。从本世纪初梁漱溟提出“新孔学”直至今天，现代新儒学已经经过了三代发展。第一代的主要代表除了梁漱溟之外，还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马一浮、张君勱、钱穆等；第二代的代表主要是一些港台学者，包括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第三代的主要代表有杜维明、刘述先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包括现代新儒家学者）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其一是反对革命，批判激进主义，鼓吹“君主立宪”和改良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二是追随港台新儒家，主张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三是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希望开辟一条“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前一段时间，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主席胡国亨先生在其著《独共南山守中国》中，提出一种“大孔子学说”，试图以孔子及儒学为基础，重新思考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建构一种能够真正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的全新文化。可以说，随着人们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和全面化、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前进，以人文主义为特征之一的现代新儒学仍会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从而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多元发展中的一支劲旅。

综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三民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文化是中国21世纪文化发展中的四种主要的具体文化类型，试图以一方、多方取代其它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由此，多种文化类型的并存共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不争事实。

三

从“文化中国”的视野出发，21世纪多元发展的中国文化如果说有什么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只能是经过现代诠释和创造性转换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称之为中

华文化。

如上所述,“文化中国”包含着不同的具体文化类型和多维的价值体系,不存在一种绝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光明的发展前途,但它不可能被大陆文化以外的“文化中国”的其它具体文化类型所完全接受,任何违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文化强制主义都是不能允许的,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尽管“文化中国”中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存在着相互沟通、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但其间的矛盾冲突是很难完全消解的,比如,三民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在传统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即使在当代,它们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立场。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成为 21 世纪多元发展的中国文化的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同样,三民主义文化只能在很有限的空间中存在和发展,尽管它构成了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决不可能成为“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自由主义文化在港、澳、台文化中占用重要地位,但在大陆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很有限。由于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所以它不但过去没能成为大陆的主流文化,今后也决不会成为“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那末,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文化难道能够成为 21 世纪“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尽管现代新儒学具有越来越大的包容性,不仅能够与现代化相融,甚至能够正视和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但它本身所具有的非世界潮流以及理想主义特征,使得它不但受到大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甚至也被港台的思想文化界所长期冷落,这一点正像方克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新儒学在港台并非思想界的主流,香港弥漫着殖民文化和西化思潮,新儒学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台湾,新儒学的势力也

不大……用台湾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新儒学不是在庙堂，而是在山林；就是在民间，它的影响也远远赶不上天主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势力的影响。”^①当然，近十几年来，这种状况随着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展而得到了改善，但它依然很难构成21世纪中国文化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

尽管现代新儒学不能成为“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但它为我们提供的思路是深刻的。因为现代新儒学蕴含着自觉的民族意识和浓厚的爱国情怀，展示了“文化中国”的根和源。应当说，21世纪“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只能是中华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文化中国”之所以为“文化中国”，并不完全在于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而在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根，即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渊源流长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国在政治上、地域上是分裂的，但在文化上却是统一的。中华文化是唯一能够把“文化中国”所有成员联系起来的纽带。不过这种中华文化并非原始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而是经过了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转换的中华文化，是具有世界性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中那些具有现实化和未来化因素的精粹。用中华文化统一起来的“文化中国”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统一战线，它的存在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地域上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并不等同于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方向，甚至构不成主流导向。21世纪中国文化的趋势是多元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整合，即多种文化类型、多维价值体系在相互冲突中的相互渗透，在相互对立中的相互结合。这种渗透和结合在本世纪就已经开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重视，

^① 邵汉明：《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归——方克立先生访谈录》，书同上，第610页。